

“电视红娘”：如何牵红线而不踩“红线”？

近日，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》及《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》两份文件，要求对近期火爆屏幕相亲类电视节目进行整改。在“后相亲时代”，“电视红娘”如何牵成姻缘红线而不踩社会道德的警戒“红线”，开始成为各卫视节目组思考的焦点。

整改，坚决驱除低俗风

“严禁伪造嘉宾身份，欺骗电视观众”“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，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，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、不正确的婚恋观。”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的两份文件中，对相亲节目的整改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。



湖南卫视引进海外版权制作的婚恋交友类节目《我们约会吧》，2009年12月面世，是最早一档电视相亲节目。广电总局下文后，记者联系上了湖南卫视《我们约会吧》的制片人刘蕾。她表示：“这个文件非常及时，节目组坚决拥护和贯彻，并组织了多次学习。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走我们真诚的路线。在节目最初上报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台的时候，湖南卫视对节目的定位就是‘真实身份、真实诉求、真实碰撞’。”

刘蕾也明确指出不会为了收视率无端制造话题：“我们绝对不会去刻意做话题和炒作，互动交友类节目保持生命力靠的就是诚意二字，嘉宾作假作秀也许能获得一时的高收视和火爆话题，但真正伤害的是普通人群交友的热情。”

江苏卫视的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因出现“宝马女”、“富二代”而备受各界质疑，成为各媒体、观众口诛笔伐的对象。在广电总局的通知下发后，该节目如何应对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记者观看了6月12日晚该节目的播出，发现一夜之间弥漫于节目之中的“非主流”价值观讨论全然不见，“宁愿坐在宝马里哭”一类的恶俗言论也不再出现。

“尽管节目是广电总局通知下发之前录制的，但通过后期剪辑，明显

感觉到以‘火辣言语’著称的节目有了很大改变。经济、金钱不再成为屏幕上嘉宾热议的话题，兴趣爱好的相互吸引、情感的真实碰撞成了讨论的焦点。”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丁加勇对此评论说。

广电总局对相亲节目下达的整改要求，不少受访观众给出了较高的评价。“相亲还是要回归人性、感情，不应宣扬太多负面的东西。”“既然是真人秀，观众有权利看到真实的人物，扼杀相亲节目的虚假之风大快人心。在影响力极大的卫视上一味地迎合低俗猎奇倾向，确实会对很多观众造成不好的心理暗示，我们呼唤绿色、清新的电视荧屏。”

相亲节目应该老实做好“电视红娘”

湖南卫视副总编辑、新闻发言人李浩认为，相亲节目不是选秀，更不是炒作红人，节目为适婚男女青年提供相识和交往机会，体现了电视媒体的引导功能和服务功能，只有“坚持走真实交友的路线”，才能吸引观众。

“当好‘电视红娘’不容易。”刘蕾告诉记者，为了确保嘉宾身份的真实性，节目组会有电话核实、分区面试、短片拍摄、后期制作的四重“保障”。

针对特殊职业嘉宾，如演员、模特、主持人、艺人等，节目组会有一套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，确保参与嘉宾是真正具有交友需求，而非以出名、作秀、炒作为目的。

“剩女时代”确实催生了“电视相亲”重出江湖，2009年“剩男”“剩女”名列最新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。

“当下‘剩男’‘剩女’成为人数最为庞大、需求最为强烈的交友群类，而电视媒体的快速、大面积传播的特点会让这种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，真实交友需求就是节目的生命力。”刘蕾说。

把握主流价值观不踩“红线”

太温柔会显得矫情，非主流则会引来骂名。如何在相亲节目中巧妙地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，是不少相亲节目组目前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。

“对于男女嘉宾在交友中的正当言行，我们可以展示，但是嘉宾们如果流露出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和涉性方面的出格话题，我们作为大众媒体，要及时纠正，绝不能去传播。”李浩说，“相亲节目应该把握住社会主流价值观，可以适当增加娱乐性和趣味性，比如加强节奏，增加互动，但这

仅仅是手段，服务性才是根本。”

“相亲节目的中心话题，无可避免地要落到现实社会中男女之间各种经济、感情的价值观上。如何正确引导节目的价值取向，相亲类节目应做深层次的规划。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，但不可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。节目制作方应通过前期筛选、主持人现场引导、节目后期制作来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，给电视受众正确的价值引导。”丁加勇说。

刘蕾告诉记者，相亲节目必须有严格的内容审核关卡。“节目录制时我们倡导真实碰撞，不免会有不适合播出的内容。但节目后期制作完成后，会由责编、制片人、台领导、宣传管理办法领导进行内容审查和考核，并且责任到人。”

此外，“后相亲时代”也应更注重各节目的创新与改良。现在，一些电视台的相亲类节目正在改版，不仅由女选男变为男选女，并且重力推行同城社交、博士专场等，力求不仅承载相亲的服务功能，还能变成一个可以经常联络的社交圈。“在满足需求的大逻辑不变的前提下，通过节目前拓展到节目外，从电视里拓展到生活中，来大大挖掘节目的内涵与外延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物特点，来增强节目的可看性。”刘蕾说。（于新）

全国至少 100 万人身份证重号 改号引起重重麻烦且花费不菲

谁该为身份证改号买单？

麻烦

20 多年的身份证被重号

方韡（化名）把身份证递进银行窗口，对面的工作人员在系统中输入身份证号时，诡秘地抬头看了方韡几眼，满脸疑惑地问：“您的身份证丢过吗？”方韡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从来没丢过。”

工作人员把“暂停办理”的牌子摆在了窗口前，拿着方韡的身份证离开了座位，和身旁的经理小声耳语，方韡被工作人员异常的举动弄得有些迷糊，方韡敲敲玻璃说：“有什么问题吗？能快点把存折给我办好吗？我还有别的事情。”

这回接待方韡的换成了银行经理，他告诉方韡，他们在输入方韡的身份证后，却发现同一个身份证下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名字。反复核查后，银行并没有发现方韡的身份证有任何问题。“我的户口是十几年前从老家转到北京的，不管在贵州老家还是在北京，都是用的这个号码。从办身份证到现在都 20 多年了。”

方韡回忆，她从未将身份证借给他人，自己也不曾办理过这家银行的业务，“我怀疑有人盗用了我的身份证号码。”一头雾水的方韡要求银行查询另一个身份证号的信息，但是除了能查到姓名外，还有另一个账户是在贵州办理的，银行也查询不到其他信息。

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方韡，可能是她的身份证号和别人的重复了，如果对方有违约记录，将给她的信用记录带来污点，给工作和生活增加很多麻烦。“我办了 20 多年的身份证怎么能和别人重号呢，要是不来银行，我还不知道有另一个人和我用同一个号码。”

探因

重号源于第一代身份证

据统计，全国身份证重号至少涉及 100 万人。据了解，我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的登记发放始于 1986

“你涉嫌吸毒贩毒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！”从未见过毒品是啥样的陕西人崔先生，只因跟毒贩的身份证号码重号，6 月初到外地出差，刚住进酒店就被警方带走。

类似身份证重号引发的离奇事件早已屡见不鲜。据统计，目前全国有至少 100 万人身份证号重复。但凡一提及，人人长吁短叹。

年，大量的重号身份证就是在那时留下的。由于当时参与登记、编号的人员多，素质参差不齐，漏登、错登无法避免，不但有身份证号码错的、重的，还有照片错的。直到第二代身份证出现，才实现了身份证全国联网，一旦有重号，输入电脑就会发现，重号问题才浮出水面。

“公安局说，出现重号的条件是，二人必须是一个行政区域内、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并且性别相同的人。”方韡开始发动贵州的亲戚寻找那位和她同号的朋友。

“出现重号，只要到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开具‘居民身份证号码变更证明’，再到户政大厅申请新证。变更也就需要 20 分钟。”一位户政部门工作人员说，如果异地出现重号，其中一方只能通过当地的户籍系统来查询另一人信息，通过双方协调解决，其中必须有一方更改其身份证号码。

如果协调不成，则遵循以下原则：制证库中有记录者，其号码优先保留，无制证记录的人重新编号；迁移人员回原籍较难，优先保留原号，未迁移人员重新编号，重号两人都属迁移人员的，迁移距离较远者优先保留原号。他还提醒重号人，



拖延越久意味着该身份证号使用越多，造成的遗留问题越多，日后处理也更加麻烦，发现重号应尽快向户籍所在派出所反映。

谁来更改 一号改动牵动几十种证件

方韡终于弄明白自己的身份证号重号的来龙去脉，但她不想放弃现有的号码，“其实改号码并不像说得那么简单，20 分钟改完的只是在公安局备案的号码，但是后面还有一大串的事情要做。”方韡犯愁的是变号之后带来的一系列麻烦，“重新建立银行账户，房产证编号也需更改，还有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以及查询与身份证挂钩的证件时，都要输入原身份证号码。也就是说，凡是和身份证相关的证件，都需要重新去办。”

方韡握着手中一大把银行卡、公积金账单以及因公因私护照、驾照等一堆证件发愁。

“经过多方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和我同号的人，相当神奇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：她和我都在一所小学上学，以前住得很近。”

方韡拨通了重号人的电话，先

和对方拉起了家常，说得最多的是她们上小学时的事情，“虽然不是一个班的，还是有共同话题，拉近点距离嘛。”可是，当方韷进入主题，说起改号的事儿，两个人都拼命游说对方改号码。

一连串的“谢谢”之后，方韷最终笑到了最后，对方答应更改身份证号。“她还没有买房买车，改号后，要改的证件不是很多。再说了，怎么说也是小学同学呢。”方韷满口许诺，以后同学来北京，方韷一定请吃饭，“我这是有同学这层关系，很多重号的人不一定有我这么幸运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”

谁来买单 证件更改费用近千元

方韷为记者算了一笔账，重新补办护照要 200 元，补办汽车驾驶证，也得花近百元钱，再加上办银行卡，需要制卡费，其他的证件也都需要工本费，“办证件还得请假，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怎么也得千元左右了。”方韷说。

公安机关虽然会免费为公民制作身份证，并出具证明，协调相关用证部门做好重错号的更正工作。但其

实，“免掉的只是身份证办理的费用，后续费用却没有人来买单。”

朝阳区户政大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身份证号码的变更，重新办理一些与身份证有关的证件，包括办理费用、误工费、交通费等，需办理人自己承担。

“更改证件产生的费用让我们承担，有点冤。”方韷认为，如果差错是公安部门失误造成的，“应对改号人有所补偿，这样才比较合理。”

1995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的《国家赔偿法》规定，自该项法律生效日起，因国家机关工作违法失误造成公民财产损失的，国家应赔偿公民直接财产损失。北京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洋认为，如果身份证重号完全由公安机关操作失误导致，那么从法理上说，换号费用应由相关部门承担。虽然损害事实和损害行为发生在法律颁布之前，但只要损害结果发生在法律颁布之后，就应该得到赔偿。

刘洋表示，因为换号而产生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直接费用包括换证引发的工本费、照相费、换证手续费等。按照法理，这些都应该属于赔偿范围。虽然路费、误工费等法理中也属于赔偿范围，“但因间接费用很难核实认定，以防有人趁机搭车，这部分费用则可以在赔偿中另行考虑。”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